第一章　文化的力量

在研究新文化是如何无意中使得穷人继续贫穷之前，我应该首先谈一谈文化变化对社会各个主要方面将会带来哪些重大的影响。对于文化的价值和理念将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这种观点，大部分现代思想，包括最新的社会历史学和文艺批评理论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各种流派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理念和价值并不产生社会现实，不过反映现实罢了。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威尔逊在他颇有影响的《真正的穷人》一书中介绍了几个最新的支持上述观点的例子。其中一个是这样的：因为下层阶级男人找不到工作，从经济观点上看他们是“不能结婚的”，所以下层阶级妇女才会生下非婚生子女。威尔逊断言，如果想改变这种风俗，惟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经济环境，给那些男人以工作。

但是，文化与社会现实、经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重要。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是由人类的选择和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盲目的、非人性的力量所决定的，那么激发人类观点和理念的源泉只能是现实状况。人类并非简单地接受上天赋予的环境，而是通过集体的力量，根据手中掌握的文化和物质资源来创造和改变环境。伟人则是通过发明新技术和新思想增加了我们可以利用的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源。

文化发展可以为经济和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例如，18 世纪约翰·卫斯理在英国创建和传播了卫理公会派，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历史学家艾利·哈列维却认为它向英国下层中产阶级和值得尊敬的产业工人灌输了一种保守主义的讲求秩序的理念，这使得英国免受其他欧洲国家所遭遇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剧变。又如，社会学家狄格比·波特泽尔通过将波士顿等级分明、独断专行的清教徒与以手足之情著称的费城反独裁的教友派相比较，得出了波士顿精英在领导国家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的结论。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源自文化王国的“自由”、“平等”、“荣誉”等理念绝对不是什么浪尖上的浮沫。

个人和群体所信奉的文化价值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才能最终决定经济条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由于新教注重个人和个人奋斗、真心希望世界繁荣，因此，新教的道德强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经济的形成。最近有些评论家将英国 20 世纪经济下滑的原因归咎于从 19 世纪开始在英国受教育阶层里产生的轻视工商业的文化心态。伟大的现代小说家V·S·奈保尔则用印度宗教文化所宣扬的清静无为和来世说去解释为什么印度的政治和经济会发展得如此缓慢。

托马斯·索威尔的《多民族美国》一书集中阐述了文化差异造成了美国各民族成功程度的不同。比如，20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裔美国人认为工作比教育更重要。于是到了 1969 年，35 岁以上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与其他同龄美国人相比所受教育程度偏低，因此他们很少拥有需要教育背景的专业技术或高级领导职位。尽管美国的许多亚洲移民初来乍到时一贫如洗，但是他们今天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足以说明文化对经济成功的巨大影响力。

经济机会只对于那些准备抓住机会的人有意义。类似整洁、准时、细心、可以信赖等文化价值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而不是结果。其他更加重要的文化特征还包括雄心勃勃、重视教育、讲究实干以及督促子女成才等等。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往往都拒绝承认文化是导致下层阶级贫穷和其他社会顽症的主要原因。自由主义者不愿承认，是因为这种观点认为应为客观经济命运负责的是个人及其信念和观点。自由主义者更愿意把贫穷的责任归咎于整个社会。既然社会是由非人性的力量所决定的，那么只要通过具有良好愿望的社会政策就能改变社会。

保守主义者，尤其是持行动自由论的保守主义者，也赞同用经济原因而不是文化原因去解释贫穷。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穷人还会长期完全依赖福利或是违法犯罪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经济算术题。保守主义者也许会这么回答：因为福利或犯罪给穷人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远大于他们能够从低薪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下层阶级的罪犯和靠福利为生的单身母亲所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反应；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做同样的事。

虽然他们双方说理的角度不同，但是都没有抓住包含在所有社会政策理论中的基本原理。我们在社会学、统计学中常常能够看到大家讨论贫困指标、非婚生率、收入分配、劳动市场、无家可归者的实际数字以及工作岗位和求职者之间是否匹配等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很少被提及，更不用说去研究了。

社会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在没有解答这些基本问题之前，我们怎么可能判断政策的方向和目标是否正确呢？

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法国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找到：社会是个体最终转变成具有优良品质的人的媒介。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家马修·阿诺德这样总结道：“文明就是人在社会中变成人。”

传统政治哲学认为，人类最美好、最明显的特质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艺术与科学、道德与良知、自我觉醒甚至个性，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在社会中创造的。普遍的社会礼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兽性的东西是怎样转化成为社会制度的：从繁衍后代到举行婚礼、从死亡到葬礼、从进食到晚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人类比靠本能生活的野兽高级。

并非只有在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转变。社会对于个人也有类似的转变作用。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就是家庭。如果没有社会、家庭的培养和教育，人类天生的潜质是绝对不能发挥出来，至少不能完全发挥出来的。每个人童年经历的发展变化与文明的进化非常相似：家庭和社会的抚育向孩子们传递了人类的文化遗产，最终把一个个小动物变成了一个个具有热情和良知的完全意义上的人。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是这一观点的最新版本。它认为是社会，而不是自然界，赋予了个人最深层次的人类特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乔治·威尔把治国方略比喻成拯救灵魂的才能并不过分。社会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起一种能够全面培养人性的社会秩序，包括理智、良知、自我、个性、创造性、判断力以及改造世界、实现人生价值的能力。这就是社会应该发挥的最根本的作用，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最根本的标准。社会绝不仅仅包括捍卫自由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了能够启发和培养全人类的无形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

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个人，个人完全是由物质力量创造的。根据这种理论，个人是如此的被动和渺小，其存在的意义、尊严甚至个性也就被抹灭掉了。自由主义实际上忽视了或故意贬低了社会政策的应有目标，即提升人类的精神。这样一来，个人就如同玉米或苜蓿，只要有点阳光、雨水和氮素就可以自生自灭，而不再是拥有灵魂的人。

个性并不是独立于环境之外的。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指出的：人人都是所处时代和地域的产物。但是个人对环境的影响决不亚于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个人通过创造性地作用于环境，不仅改变了环境，使之变得符合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最终塑造了自己。

与个人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观点认为个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保守主义观点还认为，能够精确地判断得失的有理智的人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长期艰苦卓绝的文化发展的产物。保守主义者因此也难以回答社会究竟应该具有什么作用。

但实际上，人们克制自己的进攻性、结婚生子、抚育后代、预测未来、理智地判断得失，或者通过工作来改善自己的境遇等行为都不是天性。所以，我们在考虑用经济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有人宁愿偷盗而不愿工作，或者宁愿做单身母亲而不愿结婚之前，不妨先从反面研究一下这些问题：社会是怎样培养出自力更生、理智思考、结婚生子的人的？文化是怎样将好斗、感情用事、自我为中心等人类的天性变成理性、良知和责任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会把我们带到研究社会政策的人一直避免触及的下层阶级这个难题。困扰下层阶级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未能继承能够带来全面发展、文明和有个性的自我的文化遗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就被剥夺了基本的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正是唤醒并发展那些构成文明、为个人生活指明方向、赋予意义的良知、感情、信念、价值和思考的习惯等所必不可少的。其结果是他们缺乏推理、分析和判断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至于无法主宰世界。

下层阶级的一贫如洗应该归咎于被有钱人改变了的文化。呈现在下层阶级面前的新文化尽管披着仁慈的外衣，里面却是虚伪和堕落的，因此并不具有足够的教育能力。新文化向下层阶级传递的价值和理念都是错误的，不仅不能促进、反而妨碍了个人发展。新文化对下层阶级说：你们的婚姻就是苦难；如果不靠优待你们是不会成功的；你们的成败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令我们有钱人成功的价值对你们穷人并不适用而且只会压抑你们；你们自我毁灭的行为是你们的历史和所受到的压迫的合理合法的表现……看到学校被有钱人要求的种族自由给毁了、家庭被出于善意的福利给破坏了、生活的天地变成了野蛮的无政府状态——因为粉饰太平的开明司法根本无法维持秩序，你还会对那些下层阶级顽症已经病人膏育而感到惊讶吗？

有钱人的文化在仁慈的名义下对穷人实行着不同的标准。尽管有钱人一直沉迷于某种反文化，但他们自己却依然坚持着一些重要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例如，工作、敬业、雄心、奋斗、竞争、远见等等。当有钱人尝试“文化革命”带来的个人解放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这些残留的资产阶级道德的保护。但是，当穷人被新文化蛊惑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类似的保护。有钱人为尝试性解放、吸毒或辍学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灾难性的，而穷人的代价却是万劫不复的。

只有用文化的力量才能解释下层阶级最富有戏剧化的一种异

常现象：表明穷困这种社会顽症的所有指数有一天突然同时恶化。尽管保守主义的经济动因论（查尔斯·莫雷在颇有影响的《失去的家园》一书中称之为“失败的动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宁愿依赖福利或者犯罪也不从事低薪的工作，但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始于 60 年代中期的犯罪、依赖福利、非婚生子、辍学、不工作和吸毒等问题会突然在 70 年代一块儿冲上了云霄。它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会同时堕落到下层阶级，尽管导致他们失败的动因完全不同。实际上，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这么多失败的动因（如宽大的司法和慷慨的福利）呢？

答案是，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都是改变了我们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使人联想到权威、平等、正义、法律、优点、道德、贫穷、种族和社会秩序的伟大的文化变革造成的。换言之，并不仅仅是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变化造成了贫穷，罪魁祸首是导致这些变化、并向穷人传递了一套破坏性的新规范、新价值的“文化革命”。贫民区严峻的经济条件使得迈克尔·哈林顿、奥斯卡·刘易斯等早期作家提出了“文化贫穷”这一失败主义的论调。不管是不是这样，我却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精英文化或者主流文化，正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骚动向穷人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和具有自毁性质的价值观。

在美国，贫穷问题与种族问题密不可分。下层阶级主要是少数民族。大多数预测都认为下层阶级中 60％左右是黑人、 20％左右是拉丁裔人。大部分无家可归者也是少数民族。比如，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大约有 89％的无家可归者是少数民族，在波特兰、俄勒冈等小城市里，大约有 23％的无家可归者是少数民族。

有钱人创造的新文化对少数民族穷人，尤其对黑人穷人是非

常残酷的。当民权运动在 60 年代刚刚成功地消除了机会面前的种族不平等的时候，那些认为黑人穷人应该抓住机会、勤奋工作、克己自律的主流价值观立刻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黑人穷人需要主流文化向他们提供支持和鼓励，这样才能真正地站起来并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主流文化却令他们失望。主流文化向穷人特别是向黑人灌输的不是责任和自立，而是告诉他们作为受害者，应该为他们的现状和未来负责的是社会而不是他们自己。

除了最早的欧洲移民之外，美国所有的种族都发现融入主流文化是一件既困难又痛苦的事情。比爱尔兰人逃避的饥荒及政治迫害和犹太人逃避的大屠杀还要悲惨的是黑人所遭受的奴隶制度，这使得黑人在转变自身地位的问题上尤为不利。按照尼古拉斯·莱曼颇有争议的畅销书《允诺的土地》的说法，造成黑人问题的历史渊源不止一个：刻意让奴隶们忽视自立的奴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依赖性并导致形成芝加哥贫民区的下层阶级的祖先的佃农制度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长期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残余影响，例如，日积月累的怨恨，认为人是被偶发事件捉弄的玩物而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对企业精神的压制，关注来生得救而不是今生逐步改善的救世主义，拒绝一切白人规范、绝不妥协的黑人权利运动和因此在 60 年代所造成的新的种族隔离等等。尽管在六七十年代许多黑人在有利的文化遗产的帮助下离开了贫民区而成为了中产阶级，但是由于苦难历史的余毒和忽视主动性、没有毅力、不尊重教育等习性，黑人文化一直保持着一种无助于黑人发现和把握机会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本应坚定不移地确认传统主流价值，但是有钱人却拒绝向穷人和黑人肯定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观——工作不分贵贱都是值得尊敬的。每当有人指出社会上存在

着大量缺乏技能的人也可以从事的工作的时候，有钱人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嗤之以鼻，有谁会去干那些挣不到多少钱的快餐店厨子之类的下贱工作呢？甚至于像精明的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丁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罗哈丁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纽约市援助协会主席，有时他也为自由主义刊物《纽约书评》撰写文章。民主党政府曾多次提名他担任财政部长。总之，他是有钱人的新文化的杰出代表。）在一次采访中，他对我说：“那些在压抑的环境下拼命地干着永无出头之日的粗活，而且还要养活三个孩子的夫妇都是没有出息的人。”

想想他这个评价。假设上面所说的夫妻中丈夫的工作是快餐店的厨子或者清洁工，而妻子的工作则是为汽车旅馆或者疗养院打扫房间，他们俩人的工资都是最低水平，但是加起来足以养活五口人。事实上在大城市里，快餐店的厨子的工资比最低工资要高一至两倍，而城市疗养院的清洁工的工资则大约比最低工资高50%。从物质角度来看，如果一家人年收入为三万至四万美元，那么他们的生活绝对不应是破衣烂衫而是丰衣足食。

但是，我们并不只是从物质的角度来评判人们的生活。让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上面提到的夫妇教会孩子们尊敬父母的辛勤劳动，使他们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送他们上学读书；孩子们逐渐懂得享受家庭和社区生活，他们勤奋工作、为未来着想并认为自己活得很值得；长大后孩子们都成了精明的商人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最后带着下一代前来探望爷爷奶奶。

如果这样充满成就、令人羡慕、值得称赞的人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话，那么我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上面的成功取决于信念、价值、家庭伦理关系等文化的具体内涵。尤其是家庭伦理关系，是它赋予了家庭生活以意义并给下一代创造了成功

的机会。用不着改变经济环境，只需改变家庭文化，你就能改变一切。

没有出息的人？正是他们组织并维系了家庭，正是他们找到并保住了工作，也正是他们抚育并培养了子女。不管他们是白人或是黑人，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被说成是没有出息的苦力会作何感想呢？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傻瓜，因为他们的成就并不被人承认反倒被人嘲笑。尽管他们不如身价百万的投资银行家，但难道他们不比那些毒贩子、福利的寄生虫、生下非婚生子让国家养活的人好得多吗？

下层阶级的人又会从中得到怎样的信息呢？他们会庆幸自己没有愚蠢到去找一份工资低得可怜、没有出息的工作的地步。当然，最终他们会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获得人们的尊敬。他们本可以迈出通往成功的第一步——脚踏实地地工作，但是由于罗哈丁等代表的主流态度，也就是本书试图描述的病态的“文化革命”，他们终于还是打了退堂鼓。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继续深入探讨伟大的美国“文化革命”如何剧烈地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设想和制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文化革命”发生在六七十年代，但它却是源远流长的。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当那些自认为是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嘲弄并践踏古板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时候，“文化革命”就开始了。

大约一代人以前，也就是《爱情的夏天》问世前十年，年轻有为的诺曼·梅勒在散文《白色的黑鬼》一文中描绘了一种新型的人：他很时髦，通过原子弹和纳粹集中营了解到社会和国家都是嗜杀成性的；由于生活在人类核子大毁灭的阴影之下，他也学会了贫民区黑人的那一套。梅勒写道，人们应该向贫民区文化学习，抛弃“文明那些彬彬有礼的束缚”；只要眼前不想以后；跟

着身体的感觉走，管它大脑想什么；“同社会一刀两断”；“听从自身叛逆下达的命令”；用由高潮和大麻组成的一夜风流取代那种“单一性伴侣、稳定的和令人尊敬的家庭生活”。梅勒在 1957 年所说的这番话就像预言一样，在它的外壳下面包含的是 60 年代文化运动的自我解放部分。政治学家劳伦斯·麦德指出：“黑人无法无天的文化普及之后就变成了 60 年代的白人文化。”

60 年代已经过去快 30 年了，现在抨击它就如同鞭打一匹死去的马。但是大量根深蒂固的、几代人共有的社会顽症和下层阶级文化并非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无源之水。它们是有钱人许多年前撒下的种子成熟后的苦果。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知道导致它们产生和不断恶化的根源。

文化演变是逐步进行的。那些真正重要的转变一旦发生，就会改变整个游戏，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处两处。经过了过度通货膨胀和里根时代之后，美国已经破烂不堪、黯然失色，但在某些重要的文化领域，美国仍然生活在 60 年代的纸醉金迷当中。

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不妨到凤凰城、桑塔巴巴拉等美国西部城市中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那里到处都是二十几岁的白人青年，穿着打扮就像是《爱情的夏天》里描绘的一样：头上缠着白头带、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破烂的牛仔裤和印有“哈雷·戴维森”字样的摩托或“死得其所”摇滚乐队标志的 T 恤衫。

他们中许多人之所以无家可归都是貌似有理的解放运动闹的，而那场解放运动的大军在 25 年前跟他们穿得一模一样。当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 60 年代开始沉溺于抗议、毒品、性和辍学的时候，他们的阶级还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今天工薪阶级的孩子在加入到那已过了时、褪了色的旗帜下的时候，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面临的风险则大多了。一旦辍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再也无法回到学校，变得就像无家可归者聚集地的那些年轻人一样缺少技能、纪律和生活的方向。同国内其他无家可归者一样，他们都依靠毒品或酒精生活，有的两样都缺不了。

他们中许多人的家庭都被四处蔓延的文化运动搞得支离破碎，因此饱受了冷眼和虐待。由于没有家庭的支持和引导，这些年轻人感到只能向新文化寻求“自由”，因为是“自由”让他们降临到这个世上。他们脸上暴躁和愤怒的表情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简克斯在采访中表示：“可以这样看待 60 年代：它是一次失败的实验，付出代价的只是穷人，其余的人则幸免于难。”

离开了阳光普照、开阔的贫民区下层阶级聚集地后，你还会碰上许多对 60 年代文化的拙劣的、噩梦般的模仿。在城市贫民区，例如，纽约中心的哈莱姆区，大约 80％的婴儿都是非婚生的，许多母亲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80 年代末，当时年仅 31 岁、对社会充满报复心理的凯文·沃特金斯对记者炫耀说，他自己同 4 个女人生下了 19 个孩子，其中 2 个女人带着 9 个孩子跟他一起生活在布鲁克林的一所福利院里——那可是纳税人资助的公社。这难道就是性解放吗？

当大学生开始吸食大麻的时候，海洛因已经像瘟疫一样席卷了贫民区，分别在 1966 年和 1970 年征服了纽约的哈莱姆、新泽西的纽瓦克和底特律。今天有了便宜的海洛因替代品“快克”，吸毒和犯罪把贫民区的生活真正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无政府状态：年仅 13 岁的毒品贩子趾高气扬地挎着自动武器在大街上行走，关键时候会毫不迟疑地扣响扳机。在艾滋病时代，共用针头的海洛因瘾君子和滥交的“快克”瘾君子们把贫民区的地下世界

变成了连荷兰画家布歇（1703—1770 年）和英国画家荷加斯（1697—1764 年）都未必画得出来的骇人听闻的酒色狂欢。“快克”是通往大城市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下层阶级栖息的半地下室的一个主要途径。在那些地方，你所发现的病症决非是无辜者遭受的不幸。只有当瘾君子来到贫民区之外寻找下一针的毒资或者为了争夺地盘而出现火并的时候，主流社会才会意识到下层阶级顽症对于主流社会的秩序是具有破坏性的。

“吸一口飘飘欲仙，辍学让你摆脱烦恼”曾经是 60 年代反文化的口号，而今天的下层阶级仍然将它奉为金科玉律。 1984 年，进入纽约市区高中（如布朗克斯区的西奥多·罗斯福中学、东纽约区的托马斯·杰弗逊中学、布鲁克林区的布什维克中学）的学生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能够最终获得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证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辍学率比纽约还要高。这些地方有相当多的成年人不去工作。比如，1991 年，20～24 岁的黑人男子中除了参军、坐牢等之外，只有 59.5％的人工作；18～19 岁的黑人男子工作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文化革命”包含了尝试毒品和性解放。此外，它的动力还来自人们普遍存在的对整个美国社会和道德秩序的不信任，以及民权运动和越战带来的种种不幸。“文化革命”最终不仅向穷人传达了有关性和毒品的错误信息，它还影响到了美国体制的核心——大学、法律、公共学校、福利制度、精神病院等等，进而从具体的方方面面影响了穷人的生活。

那么，首先，谁是穷人呢？

第二章　下层阶级

当谈起穷人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往往是“那是上帝的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旦你陷入贫困就会成为下层阶级的一员。

因为贫穷并不是这个使人头疼、随处可见的穷人中的亚群体的定义特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导致下层阶级与你们和大部分穷人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自伤性的行为以及引发这些行为的世界观。在所有城市里的穷人中，所谓的下层阶级只包括那些往往世代相传的既贫穷又有依赖性的人群。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早在 25 年前就发现了这种“自我延续的顽症”——长期无法无天、吸毒、非婚生子、不工作、依赖社会福利、学业失败等等。

除了以上的外在表现之外，这个群体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也是与众不同的。在贫穷面前他们缺乏内在的文化脱贫工具：价值、雄心、毅力、社会技能、基本的读写和算术能力以及对社会从属关系的认同。有的人尽管外部环境很不好，但是至少内心还有上面这些优点。而下层阶级则具有截然相反的精神和情感，这使他们抓不住美国生活为他们带来的经济机会。

只要听听下层阶级的声音，不管是在街上偶然听到还是通过

新闻报道，你立刻就会发现一种浮躁不安的世界观：

“哥们儿，你都两三年没工作了，整天就知道闲逛、吸大麻和喝酒，你这会儿找到工作肯定应付不了的。告诉自己：‘我不想早起，不想挤车，不想被人催着工作，我只需要福利。”，

“我能有什么工作机会呢？麦当劳还是汉堡王？我才不干呢！”

“人们不知道卖身也是很辛苦的工作。警察会抓你，对手会抢你的生意，小孩会偷走你的毒品，弄得你成天紧张兮兮的。”

“有一次我倒霉催的费了老劲才劫到一个人，结果什么都没弄着……我一气之下在那小子的脖子上拉了一刀，管丫的是死是活。”

“社会就是这样，黑人绝对没有奔头。我不会有什么美国梦的。我他妈就活该坐大牢。”

“早点生孩子，等我长大了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 PARTY。”

“这里就是美国的兽笼哈莱姆。你必须打拼才能生存。周围的人都是些任人摆布的行尸走肉。”

他们的话是虚张声势也好，是自哀自怜也罢，是虚无主义也好，是失败主义也罢，总之反映了下层阶级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无家可归、堕落和生活的烦恼。他们的贫穷远远超出了没钱这个含义，而是一种社会贫穷、道德贫穷和精神贫穷。这些声音反映的“下层阶级”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状况而不是经济状况。

毕竟在 20 世纪末的美国，要摆脱贫穷虽然很难，但并不是没有可能。人口调查时有些人被算作穷人，但他们大多不属于下层阶级。而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穷困状况往往并不会持续太久。统计数字所揭示的摆脱长期贫穷的秘诀很简单：读完高中，找到

并从事一个哪怕是最低工资水平的全职工作，像成年人一样结婚并维持每一段婚姻。由一群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召开的“家庭与美国福利政策研讨会”指出：“这些都是费神费力的任务，但绝不是只有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通过对 70 年代各行业从业人口收入的综合分析，研讨会成员查尔斯·莫雷得出了一个结论：只需拥有一张高中文凭就足以赶走贫穷。根据他的研究，读完四年高中的人里只有 0.6%的成年男性和 2% 的成年女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这种情况下，难怪贫穷问题专家给下层阶级下了这样的定义：一群不会观察、考证和解释问题的长期、甚至世代相传的贫穷的人。

组成下层阶级的个体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普雷斯顿·西蒙斯，家住纽约布朗克斯，绰号“小大人”。他从一个无名鼠辈一举出名都是因为在 1989 年感恩节那天，他被人用 9 毫米自动手枪击中了 11 枪而死亡。他死时年仅 14 岁。

他在七个非婚生子女中排行老四。他最小的弟弟在他死的时候才 15 个月大。1969 年他的母亲读高二的时候就因怀孕而辍学了。此后的 20 年里她一直依赖福利生活。他的父亲吸毒而且脾气暴躁，分分合合、吵吵闹闹地和他的母亲一共生活了两年。有时好久不见的父亲会突然破门或者越窗而入。他的母亲控告他的父亲殴打她和孩子，最终法庭下令他的父亲不能再接近他们。

他曾经居住在城堡山庄，那是东布朗克斯的一处公共住房工程，是几栋高大但不结实的红砖塔楼。大楼的电梯和门厅里弥漫着尿臊味，墙上到处都是恶意涂抹的污言秽语。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是不会产生社区精神的。更糟糕的是，这里和其他公共住房小区一样，枪声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当地一个十几岁的居民

对《纽约时报》记者凯文·萨克说：“人们会为了一件衣服、毒品、钱、甚至多看人一眼而丧命。为了五美元他们就会朝你脑袋开枪。”

1988 年夏天，搬进城堡山庄之前，“小大人”一家曾在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居住过一段时间。再以前他们同姥姥一起挤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姥姥和妈妈一样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母亲。

教育对“小大人”没有起多大的作用。由于被认为患有难以在普通条件下学习的多动症，学校把他编入了一个特殊教育班。多动症在下层阶级学龄儿童中非常普遍，常常是由于母亲在怀孕的时候饮酒、吸毒或营养不良造成的。

“小大人”有两个重要的课外活动。一是在小区的运动场上贩卖五块钱一包的大麻。每天最多他能赚到 45 美元。在他死前不久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身穿肥大的带帽短外套，脸上带着冷酷、挑衅和不屑一顾的神情。他曾经威胁要与毒品供应商竞争，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认为这是他被杀的原因。

他的第二个课外兴趣是他的女朋友。当“小大人”死的时候，17 岁的女友已经怀上了他的骨肉，这意味着他的家庭有了第三代非婚生子。“小大人”短暂的一生显然都生活在卡通般的宣扬男性气概的世界里，因为他从粗野冷酷的孩提时代起就给自己起了一个颇有男子气的外号。

“小大人”的悲惨故事还有一个更悲惨的尾声：他的家人和朋友对于他令人毛骨悚然的生与死都漠然处之，甚至认为他的孩子肯定也会跟他一样。他女友的哥哥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解释说：“‘小大人’卖毒品的理由跟所有干这行的小混混儿一样：年轻人都想赶时髦，而赶时髦是很费钱的。”他明知道有可能因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